

009941

泉州市志

QUANZHOU ANNALS

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第五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

福建省

泉州市志

第五册

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卷四十五 华 侨

概 述

泉州市是全国著名侨乡，有 600 多万名祖籍泉州的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 110 多个国家、地区，其中 90% 居住在东南亚各国。泉州市有归侨、侨眷 300 多万人，占福建省归侨、侨眷总数的 50% 以上，占全市总人口的 53.9%。1990 年，全市 139 个乡镇中，75% 是重点侨乡。

泉州华侨出国的历史悠久。唐代泉州沿海一带地狭民稠，田不足耕。人民在围垦海滩，向大海要粮的同时，开始沿着海路外出谋生。宋元时期，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航点和东方大海港，泉州人出洋兴贩贸迁蔚然成风。明清实行“海禁”，泉州港随之衰落，使大量依赖海上贸易维生的泉州人不得不冒险向外拓展，以至在国外垦荒辟地，作久留之计。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居留海外的泉籍华侨估计已逾 30 万人。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南洋群岛各埠的开发和“契约华工”制度的发展，以及家乡的战乱、天灾人祸，使泉州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和世界各地。不断的再移民，又使海外泉州人分布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展。

泉州人到达侨居地后，与当地居民并肩劳动，拓荒垦殖，修桥造路，建立村镇，兴办文化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尽了一些力量。在开发、建设侨居地的过程中，少数乡亲通过长期积累和勤奋经营，在侨居地进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企业得到发展。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下简称“二战”）后，海外泉籍乡亲中已涌现了少数财力雄厚的企业家和大企业。泉籍乡亲与侨居地国家和人民荣辱与共，他们积极参与、支持当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为居住国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侨居地获得独立创建国家之后，他们绝大多数先后参加居住国国籍，成为居住国公民。

海外华侨关心祖国的兴亡安危。在历次民主革命运动中，无数华侨爱国志士与祖国人民一道出钱出力，毁家纾难，前仆后继，英勇献身，在中国革命史和闽南革命史上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辛亥革命时期，不少泉籍华侨在侨居地加入中国同盟会，出资出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光复厦门、泉州之役，不但经费大多来自华侨，主要组织者和大部分领导人也是来自国外的泉籍华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 年 10 月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

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多数执委是泉属各县籍华侨。南侨总会发动和领导东南亚广大华侨支援和参加祖国抗战。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大批泉籍华侨从东南亚各国回到闽西、闽南、闽中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为福建省和泉州的解放作出重大贡献。

泉籍华侨一贯关心祖国和家乡的经济建设事业。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在泉州和厦门、漳州、福州，以至上海等地投资办企业。自民国初年到1949年8月泉州解放前夕，举凡开辟公路、组织汽车运输公司和电灯公司等与城市发展有关的公共事业，几乎都是泉籍华侨投资倡办或独资创办的。泉州商业和金融业兴盛，市场活跃，又是与充裕的侨汇分不开的。新中国诞生以迄1966年，泉州地区多数国营企业的前身都或多或少有华侨投资的成分。1980~1990年，华侨又在泉州投资1800多万美元创办70多家企业。

泉籍华侨捐资家乡公益事业可上溯到明代后期，至19世纪后期逐渐增多。进入20世纪，除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外交通隔绝外，返乡举办公益事业的人士从未间断。1979~1990年，华侨和海外乡亲捐资泉州各项公益事业达7.9亿多元人民币，其中对教育、文化事业的捐赠尤为突出。对卫生、体育、交通、水电设施、市政建设、工农业生产、宗教祠庙、赈灾慈善、扶贫敬老和侨联会所，也都慷慨解囊，为泉州市及所属各县（区、市）文教事业的发展，以及增进社会福利作出重大贡献。造福桑梓，影响深远。

清政府自同治年间（1862~1874年）起，就在国外设领事保护华侨。其后，劝捐、护侨、争取华侨投资、沟通侨汇、华侨教育等项侨务工作逐渐展开，并在厦门设立保商局以保护福建华侨。但清末吏治腐败，敲诈勒索归侨、侨眷事件不断发生，侨务工作成效甚微。民国元年（1912年）8月，福建暨南局在厦门成立，并在泉州设立晋江分局。由于民国初期社会动乱，侨务机构经常更迭，侨务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民国23年12月，福建省设立厦门侨务局。厦门沦陷后，厦门侨务局于民国27年11月迁设泉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泉州地区先后设立晋江专署侨务科（局）、归国华侨联合（谊）会。认真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侨务工作方针和政策，在维护华侨、归侨、侨眷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受“左”的影响和干扰，也曾有过某些失误。“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机构被撤销，侨务工作受到严重破坏，产生一些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侨务机构，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加强保护华侨、归侨、侨眷权益工作，侨务工作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第一章 移居国外

第一节 出国

唐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成功。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载，随行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昙静”。

唐代中期，随着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历（766~779年）中泉州涌现“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的兴盛景观，对泉州人的成批移民出国起了促进作用。据考古资料，在唐代因华侨众多而被称为“小中国”的桑多邦（闽南人称为“山猪墓”）发现有唐代泉州出产的黑瓷与白瓷。在文莱，也发现过安溪的唐瓷，从而证明文莱已有泉籍华侨。咸通十四年（873年），泉州僧人释智宣出国取经，在印度侨居25年，于天祐四年（907年）回国。清乾隆《泉州府志》载：唐末五代初王潮、王审知兄弟及其后裔王延彬据闽期间，发展生产，大兴海舶。到了闽国晚期，“弊政百出”。泉州地区人民成批逃往国外谋生。

北宋泉州人出国，见诸国内外资料的有：《宋会要》载有泉州海商邵保往返占城的事迹。据《高丽史》及中国史籍记载，大中祥符八年至元祐六年（1015~1091年），前往高丽的泉州人有林仁福、陈文轨、卢遵等19批次，其中注明人数的有7批500多人。其中欧阳征、陈亿、刘载等人留在高丽为官。《参天台五台山记》载，熙宁三年（1070年）已有泉州人往日本。日本的史料录存的泉州客商、纲首李充的“公凭”载：李充及同船计67人，于崇宁元年（1102年）贩丝瓷往日本，滞留两年后回国，翌年再往。

南宋时期，泉州人口继续增长，人稠地瘠，且造船业发达，为泉州人远航提供有利条件。此后，侨居国外者渐多。（宋）《夷坚志》载：泉人王元懋，“少时祇役僧寺，其师教以南番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番汉书，延为馆客，及嫁以女。居十年归来”。南宋后期，暹罗素可泰王曾慕名招来中国工匠，仅晋江磁灶吴氏族人就有多人“泛海传艺”。1972年，文莱穆斯林公墓发现一块南宋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1264年）男应、甲立”，为宋代泉州人侨居国外的物证。宋代三佛齐与泉州之间关系密切，有不少泉州人定居印尼三佛齐，从事农业生产。宋末战乱，“泉州地区居民纷纷外出逃洋”，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到柬埔寨和泰国等地。

元朝致力于拓展海外贸易，泉州列居东方大港，泉州人出国较前兴盛。据《岛夷志略》载：元代，泉州对外交往已达99个国家和地区。其时，泉州与爪哇之间有船舶通往，流离其地的泉州人颇众。《岛夷志略》古里地闷条载：“昔泉之吴宅（今属鲤城区河市镇），发舶稍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既毕，死者十之八九，间有一二而多羸弱乏力驾舟随风回舶。”同书还记载有泉州人“往麻逸国、苏禄”。

元末战乱和明初“海禁”，泉州港逐渐衰落。明初，泉州只“通琉球”。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赐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据《久米村蔡氏家谱》载：始祖讳崇，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备三十六姓之例奉敕来铎中山。中山蔡姓，自此始也”。这些是泉州人移民琉球的具体例证。其后，明朝廷再赐姓的尚有泉州林姓，其中林易庵于成化二年（1466年），率长子林琛引琉球入贡，林易庵以年迈请准回乡养老。有些向来依港市贸易为生的泉州人，不得不向海外发展，其中假道琉球往日本、高丽（今朝鲜）及南洋各地的，为数不少。《瀛涯胜览》也记载：杜坂，“此处约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中国广东及漳、泉州人多逃居于此”。同书还记载：“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国人多广东、漳泉人逃居此地”。据（英）W·J·凯特《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书记述：明初，在今印尼的杜坂、锦石、旧港、泗水、饶洞、日葛礁及西婆罗洲等地已有华人居住区，以福建闽南人占多数，并已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进程。据推算，明初，印尼各地的华侨最多时估计总数至少有2万多户、5万多人，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应不少于10万人，

其中泉籍华侨人数约有四五万人。

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起,倭寇屡犯泉州,战乱频仍,灾荒饥馑,农民破产,逃生海外日多。如《石狮蔡氏宗谱》载:“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纷纷外逃出洋”。安溪县龙门地区因倭寇入侵被迫出洋的有七八百人。《海国图志》载:“嘉靖间,闽粤人多至满刺加”。《瀛涯胜览》冯承钧注也提到:“嘉靖间,漳、泉及潮人多至马刺加、渤泥、暹罗”。《明会要》载:嘉靖间,张链居三佛齐,“列肆为番船长”,“漳、泉人多附之”,“嘉靖而后,国用不足,屡行加派”,加上灾荒所迫,泉州地区出洋人数就更多了。安溪《尚卿苦竹林吴氏族谱》和《金谷河图郑氏族谱》,永春《岵山陈氏族谱》和桃城《鹏翔郑氏族谱》均记载了族人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往日本、吕宋等地的情况。至万历年间(1573~1619年),“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仅晋江金井坑西村,万历三十四年前后漂洋过海前往吕宋的即达150多人。见之于安海黄、陈、颜三姓族谱,自万历三十五年至崇祯十二年(1607~1639年)卒葬吕宋者即有13人。嘉靖、隆庆年间,金门居民也开始向海外移居。

明朝后期,东南亚华人区不断扩展。16世纪中期,安海颜姓即有5人卒葬顺塔(即万丹)。其他,如乌戎卡鲁、马鲁古、马辰、望加锡、巴城(雅加达)、三宝垄等都有不少泉籍华侨。而前往日本的人数,也续有增加。南安石井人郑芝龙,万历四十年往长崎,当时日本有华侨3万多人,泉州人李旦为平户华侨领袖,与其弟李华宇同为平户最有势力的海商。芝龙的岳父翁翌煌也是泉州人,他的结拜兄弟中如排在前列的船主杨天生、张宏即分别为晋江、南安人。

清代泉州人出国高潮迭起。清初的“海禁”和“迁界”,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惨剧。濒海船户、渔民、商贾,或随郑成功东渡台湾,或辗转流寓南洋,就连山区德化县也有徐奇勋因往南洋经营致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入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原来随郑成功渡台的泉籍官兵不愿回内地者,相继乘船赴小吕宋或爪哇、马六甲各处。翌年,“海禁”解除。此后,从安海、后渚经厦门、澳门、广州往国外的泉州人,见于各侨乡族谱的记载,不胜枚举。如永春《东山鲁国颜氏族谱》、南安石井《曾氏族谱》、《洪氏族谱》以及安海10姓11部族(房)谱,均有族人往吕宋、暹罗、巴城、安南、日本、文莱、柔佛的记载。

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虽再次实行“海禁”,仍有不少泉州人私下出洋谋生。庄为玠等《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的几个问题》一文的附表载: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仅晋江县侨乡族谱记载前往泰国、越南、柬埔寨三国就有46人。

鸦片战争后,殖民者开始在厦门、金门干拐卖华工的罪恶勾当,人口贩子深入泉属各县“招募”华工。泉州地区的劳动人民成为西方殖民者拐卖出国的“契约华工”的主要来源。据《华工出国史料》第三辑及冲绳县《历代宝案》载,1852年,美国“猪仔”船罗伯特·包恩号从厦门运出410名(一说475名)遭难“契约华工”中,载明祖籍为晋江、惠安、南安、安溪、永春五县的泉州人共207名。在殖民者支持、纵容下,东南亚华人私会党控制的华商“客馆”经营贩卖“契约华工”的规模更远远超过西方殖民者的拐卖华工活动。

此外,因农民起义失败逃亡国外和遭受自然灾害被迫出洋谋生的,以及传统的牵亲引戚前往国外的自由移民,也有相当数量。例如咸丰三年(1853年),以永春林俊为首的红钱会

起义失败后，林俊的儿子观麟、观柔和部属姚元章等一起逃往印尼。同年，惠安县邱二娘和安溪陈圣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后，也有一些人逃往南洋。同治四年（1865年），永春人民反征收“厘金”火烧税馆事件发生后，因统治者残酷镇压，导致大批人出国。光绪十八年（1892年），德化陈拱领导的反盐税农民起义失败，陈拱的家乡浔中丁溪“父老相率渡洋者不下数十家”。陈拱的军师德化赤水陈政楷兄弟和先锋陈政合同时出走马来亚。辛亥革命前夕，新马地区“三生馆”领袖戴炎、蔡水应及拳师魏木器都是逃亡国外的泉州“三合会”会员。泉州南门外亭店村杨嘉种及其宗亲牵引出洋前往菲律宾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有600多人；泉州新门外树兜村蒋备球及其族亲往印尼泗水的，至民国初达千人以上。

表 45-1

1841~1911年泉州出国人数净增情况表

单位：人

年 份	净增长	年 平 均 数	年 份	净增长	年 平 均 数	年 份	净增长	年 平 均 数
1841~1875	164280	4694	1886~1890	37625	7525	1901~1905	133752	26750
1876~1880	11641	2328	1891~1893	29614	9871	1906~1911	198377	33063
1881~1885	29727	4955	1894~1900	103629	14804	合 计	708645	9981

注：本表根据戴一峰《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的数字测算。

清末民初，泉州沿海地区封建械斗盛行，导致田园荒芜，村民纷纷外逃出洋。晋江林股械斗中，前仓村24户中有16户18人先后往印尼、菲律宾等地。民国3年（1914年）春涝、秋旱；民国5年大旱，水井、河流干涸；民国6年，台风暴雨成灾；紧接着护国军、靖国军、粤军、北洋军此来彼往，战火纷飞，抓丁、抓夫、派款、派饷，人民饱受苦难，纷纷携眷漂洋过海谋生。

民国7年以后，泉属各县民军蜂起，各霸一方，互相攻掠争战；日为军，夜为匪，兵匪一体，敲诈勒索，烧杀抢掠，弄得鸡犬不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造成泉州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出国潮。据民国10年9月9日《奋兴报》载：“吾永（春）……近来政变，地方骚乱，匪徒蜂起，遂相率遁逃，挈妻携孥，偏安海外，此吾邑年来所以十室九空也。”同年，安溪湖头后坑陈氏反抗民军骚扰，打死匪首陈梧桐，因怕报复，全村200多人逃往新加坡。民国12年4月，晋江金井坑西村，因陈国辉匪徒骚扰，全村400多人有300余人四处逃难，其中不少逃往海外。民国14年7~11月，“永（春）德（化）民众苦于军匪，相率渡洋……达六千余人”（《崇道报》载《永春18年来大事记》）。民国15年，泉州地区因民军混战出国人数估计近20万人，净增数超过13万人。

民国16年国内大革命失败后，泉州各属有不少人被迫出国。此后，也有不少人为逃避抓壮丁前往国外，如石狮钞坑村民因逃避抓壮丁，一天中前往菲律宾的竟达40多人。

民国23年，南洋橡胶和锡价格上涨，海峡殖民地急需劳工，以及国内农村经济破产和抓壮丁的影响，泉州地区出国人数迅速增多。民国23~27年，泉州地区出国人数估计净增

近 10 万人。其中永春县出国的青壮年达二三万人，岵山乡因青壮年男子出国，几乎成为“女人国”。

民国 27 年 5 月厦门沦陷后，大部分华侨出国改从泉州经上海转赴南洋各地，交通不方便，加上南洋各口岸限制华侨入口，造成泉州地区华侨出国人数锐减。

表 45-2 1912~1938 年泉州华侨出国人数净增情况表 单位：人

年 份	净增减数	年平均增减数	年 份	净增减数	年平均增减数
1912~1915	+ 72519	+ 18130	1927~1930	+ 55978	+ 13994
1916~1920	+ 98319	+ 19664	1931~1933	- 94823	- 31608
1921~1925	+ 110426	+ 22085	1934~1938	+ 98068	+ 19614
1926	+ 136924	+ 136924	合 计	+ 477411	+ 17682

注：本表根据戴一峰《近代福建华侨出出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一文数字，按其中泉州出国人数占全省出国人数的 60% 进行测算（1916~1920 年、1921~1925 年、1926 年分别按 70%、80%、90% 计算）。

民国 28 年，泉属各县从泉州口岸出国人数，据《福建华侨档案史料》所载净增 3426 人。此后，泉籍华侨回国的急剧增多。据民国 34 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编印的《侨务工作十三年》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有 135 万多名华侨回国，其中福建华侨 40 多万人。估计这一时期泉籍华侨回国人数在 25 万人以上。民国 34 年秋至民国 35 年，东南亚各国战争创伤未复，一时无法吸收新移民，出国人数仍然少于回国人数。

民国 36 年起，泉州地区出现了出国高潮衰落后的短暂出国高峰。据厦门侨务局统计，民国 36~38 年 9 月，从厦门出国人数净增 84625 人。另据林真《战后闽籍华侨复员东南亚问题概述》一文统计：民国 36~38 年，闽籍华侨复员东南亚人数 19682 人。而据泉属各县（区、市）有关侨情调查资料估计，民国 36~38 年间，泉州地区出国总人数达 25 万人左右，其中部分经香港移居到世界各地。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社会安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改善，从根本上消除了促使劳动人民大量出国的因素；加上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并采取进一步限制华侨入境的政策，泉州地区移居国外人数大幅度下降。但作为中国著名侨乡，出国人数仍然不少。尤其晋江县出国人数 40 多年来一直居泉州各县、市首位。另方面，1949 年 10 月至 1951 年，华侨青年回国学习和参加祖国建设人数至少在 5 万人以上。据福建侨务委员会 1951 年公布的材料，晋江专区各县、市（缺金门县数字）旅外华侨有 120 多万人。

1950~1990 年，泉州人移居国外曾出现三次高峰：第一次在 1956~1962 年，共有 4 万多人经香港转赴国外定居。其中 1956 年、1957 年、1962 年出国人数较多，年达 6600 人以上。同期，回国定居的也有 4 万多人，出国与回国的人数大体持平。第二次高峰从 1972 年持续至 1979 年，以 1978 年出国（境）18839 人最多，占全省出国（境）人数的 70%，其中部分滞留香港、澳门。第三次高峰出现在 1985 年以后，每年移居国外的均在 4000 人以上。

其特点是大量以自费留学或旅游、探亲出国后，转为定居；以投资移民形式出国的人数亦颇众。

表 45-3

1950~1960年晋江专区出国人数统计表

单位：人

年 月	出国人数	年 月	出国人数	年 月	出国人数
1950	1205	1954	4310	1958.1~6	2238
1951.6~10	1406	1955	4331	1958.7~1959	3776
1952	2040	1956	6707	1960	2460
1953	2187	1957	6639	合 计	37299

第二节 分 布

自唐代开始，泉州人因商贸、谋生、避乱、游历前往今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置市舶司后，泉州海商前往的国家渐多。至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泉州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此后，又有不少的泉州人在泰国、柬埔寨定居。元代，泉州海商前往的国家、地区进一步增多。至元末明初，旅居海外的泉籍华侨估计已达四五万人。

明代中后期，葡萄牙殖民者在闽南沿海劫掠劳动人民运到印度果阿卖为奴隶。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窃踞澳门后，一直以它作为从事“凌棘居民”、“掠卖人口”的据点。有些被掠卖的闽南人被转运到非洲的阿尔及尔和莫桑比克当奴隶，这是泉州人移居非洲之始。16世纪初，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在漳州月港、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大帆船贸易”的兴起，泉籍华工、华商随船前往墨西哥、秘鲁，有的并在当地的纺织工场中做工。这又将泉籍华侨居住地扩展到南美洲。

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开始有泉州人定居新加坡；道光年间（1821~1850年），已有永春人侨居老挝的闽楼（芒隆）。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旅居海外的泉籍华侨估计总数已达30多万人，分布在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文莱（包沙撈越、北婆罗洲）、柬埔寨、日本、南朝鲜、老挝、琉球、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帝汶、印度、伊朗、墨西哥、秘鲁、南非、毛里求斯等21个国家和地区。

鸦片战争后，被西方殖民者招募或拐卖的“契约华工”，有的幸存下来，在契约期满后再移民；也有些华侨开始从东南亚向欧美移民；加上泉籍海员受雇于远洋轮船等因素影响，泉籍华侨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至宣统三年（1911年），估计海外泉籍华侨总数已超过80万人。分布在印尼、马来亚、北婆罗洲（沙巴）、沙撈越、纳闽、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文莱、帝汶、日本、朝鲜、锡兰（斯里兰卡）、印度、伊朗、埃及、留尼汪、毛里求斯、塞舌尔、马达加斯加、南非、刚果、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斐济、新喀里多尼亚、西萨摩亚、大溪地、檀香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古巴、牙买加、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荷属西印度群岛、秘鲁、智利、巴西、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哥伦比亚、荷兰、法国、英国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分布状态，自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 40 年代没有多大变化，仅增加德国、苏联等几个国家，但出国人数却有较大增长。

表 45-4

1939 年泉籍华侨分布情况表

单位：人、%

国家、地区名称	华侨总数	闽侨人数	闽侨占总数比例	泉籍华侨数	占总数比例
荷属东印度	1232650	739540	60	406775	33
马来亚、新加坡	1709392	854695	50	564100	33
菲律宾	110520	85400	77	82890	75
缅甸	193548	77400	40	54193	28
安南	381417	75265	20	45770	12
暹罗	2500000	376000	15	180000	7.2
北婆罗洲	75000	30000	40	9000	12
其他		11502		7000	
总计		2249802		1349728	

注：1. 闽侨数据《闽侨》月刊统计数，扣除台湾 25015 人，香港、澳门 82554 人。

2. 泉籍华侨数根据福建省历次侨情调查泉籍华侨在闽籍、闽南籍华侨中的比例测算。

表 45-5

1940 年泉籍华侨分县统计表

项 目	惠安县	晋江县	南安县	安溪县
华侨数 (人)	154364	262565	224325	96582
占泉籍华侨比例 (%)	15.23	25.9	22.13	9.53
项 目	永春县	德化县	金门县	合计
华侨数 (人)	144694	57542	73568	1013640
占泉籍华侨比例 (%)	14.27	5.68	7.26	100

注：本表据 1941 年初厦门侨务局数字（部分数字未分解到县）。

新中国成立 41 年来，由于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中国政府鼓励海外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90% 以上的东南亚各国华侨先后成为外籍华人，仅与祖籍地保存若干亲缘关系。

50 年代以来，由于东南亚国家华商经济的发展，商务、投资活动的日益国际化，居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泉州人出现了再移民的热潮；而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印支难民潮的出现，使大量泉籍印支华人，包括大量多代土生华人流向世界各地，使泉籍华侨、华人分布的国家、地区大增。

50 年代以来，对海外泉州人分布情况先后组织四次调查。1958 年至 1960 年 6 月和 1986 年至 1988 年 6 月的两次为全市性调查统计。

表 45-6

1958~1960 年间晋江专区海外华侨分布情况表

单位: 万人

县(市)别	印 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其 他	合 计	附 注
泉 州	4.4	1.04	1.33	6.51	1.52	14.8	其他主要指缅甸、越南、泰国、美国、日本、西欧
惠 安	0.42	7.7	3.5	1.32	1.06	14	其他主要指缅甸、泰国、越南、日本
晋 江	5.76	2.9	1.92	36	1.42	48	其他主要指越南、缅甸、泰国、日本、美国、北婆罗洲
南 安	9	11	6.52	8.16	5.32	40	其他主要指缅甸、越南、泰国、荷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北婆罗洲、美国、南美洲
安 溪	3.5	3.92	4.48		2.1	14	其他主要指缅甸、泰国、菲律宾、越南、北婆罗洲(包括文莱)
永 春	3	23.7	1.55	0.8	0.95	30	其他主要指缅甸、越南、泰国、北婆罗洲、日本、美国、澳大利亚
德 化	0.15	6.8			0.05	7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 其他主要指菲律宾、越南、泰国等

注: 1. 本表据晋江专区侨务局档案资料编制。调查时间为 1958 年至 1960 年 6 月。

2. 金门数字暂缺, 主要分布新加坡、印尼、马来亚、文莱、菲律宾、越南、日本、泰国、缅甸。

表 45-7

1986~1988 年间国外泉籍乡亲分县调查表

单位: 万人

县(区、市)	总 数	分布主要国家和地区
鲤城区	28.63	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缅甸、泰国、越南、加拿大、日本、柬埔寨、意大利、英国、奥地利、瑞典、北马里亚纳、关岛、阿根廷、玻利维亚、法国、德国、荷兰、印度、委内瑞拉、巴拿马、巴西、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秘鲁、汤加、埃及、圭亚那、苏里南、巴哈马、贝劳(帛琉)
石狮市	17.874	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越南、澳大利亚、缅甸、泰国、日本、比利时、西班牙、阿根廷
惠安县	67.434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缅甸、美国、泰国、越南、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毛里求斯、新西兰
晋江县	76.35	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越南、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柬埔寨、日本、印度、尼泊尔、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巴布亚新几内亚、老挝、几内亚、苏丹、希腊
南安县	128.6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缅甸、泰国、美国、越南、加拿大、澳大利亚、委内瑞拉、苏里南、柬埔寨、荷兰、德国、英国、瑞典、巴西、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斯里兰卡、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
安溪县	68.304	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泰国、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柬埔寨、英国、德国、荷兰、文莱、毛里求斯、老挝、希腊

续表

县(区、市)	总数	分布主要国家和地区
永春县	60.45	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菲律宾、缅甸、越南、泰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柬埔寨、文莱、委内瑞拉、巴西、瑞典、斯里兰卡、法国、德国、新西兰
德化县	12.084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荷兰、美国、菲律宾、越南、缅甸、瑞士、泰国
金门县	31.1	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泰国、缅甸、日本、美国
合计	490.826	

注：本表数字为1986年6月至1988年6月泉州市侨情调查数，其中金门为《金门县志》1987年数字。

表 45-8

1990年国外泉州人分布表(一)

单位：万人

国家、地区	泉籍乡亲人数	国家、地区	泉籍乡亲人数	国家、地区	泉籍乡亲人数
印度尼西亚	154	缅甸	17.5	加拿大	4.5
马来西亚	168.1	越南	10	澳大利亚	3.5
新加坡	86	文莱	3.1	柬埔寨	3
菲律宾	124	日本	0.9	巴西	1.2
泰国	26	美国	15	其他	7.2

表 45-9

1990年国外泉州人分布表(二)

区域	万人以下千人以上	千人以下百人以上	百人以下
亚洲	印度	斯里兰卡、老挝、韩国、孟加拉国、东帝汶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阿联酋、伊朗、也门、尼泊尔、科威特
欧洲	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瑞典、奥地利	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西班牙、丹麦、葡萄牙、挪威	希腊、卢森堡、芬兰、马耳他、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
非洲	毛里求斯、留尼汪岛	南非	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利比里亚、几内亚、赤道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塞舌尔、坦桑尼亚、赞比亚、斯威士兰、莱索托、马拉维

续表

区 域	万人以下千人以上	千人以下百人以上	百 人 以 下
大洋洲 (太平洋区域)	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	北马利亚纳 (塞班)、关岛、汤加、所罗门群岛、塔希堤、斐济	密克罗尼西亚、贝劳、马绍尔群岛、新喀里多尼亚、瑙鲁、东萨摩亚、西萨摩亚、瓦努阿图
中美洲	巴拿马、墨西哥	古巴、伯利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哈马、安提瓜和巴布达	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多米尼加、牙买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尼加拉瓜、海地、百慕大群岛
南美洲	委内瑞拉、苏里南、秘鲁、阿根廷、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智利、巴拉圭、圭亚那	厄瓜多尔

注：本表根据1990年有关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第二章 在居住地

第一节 在印度尼西亚

一、移 居

印尼是泉州人移居历史最早、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五代至北宋年间，泉州“每岁造舟通异域”，位于今印尼国境的闾婆、三佛齐、新拖、苏吉丹、巴林冯（邦）、蓝无里（兰里）等，与泉州都有贸易关系。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兰里（亚齐），成为泉州商人的聚居地。

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从泉州出兵征爪哇，遇风舟损，有患病士兵百余人留居勾栏山（格兰岛），也有散失的士兵居留爪哇。当时前往印尼商贸的泉州人，足迹已远至西里伯。

元末至明中期，成批的泉州人居留杜坂、锦石、泗水、旧港、万丹、三宝垄等地，形成华人聚居的村社。《明史》记载：顺塔，又名下港，在岛北海滨，流寓者多广东及漳泉人。泉州侨乡族谱中亦有不少关于族人卒葬上述地方的记载。

16世纪末，荷兰殖民者入侵印尼。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为筹建巴达维亚城，采取让华商到中国沿海招募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往巴城的措施，原籍泉州的曾聪即系当时巴城著名的劳力经纪人，每年从闽南地区招募大量的华工用帆船运到巴城。为了管理华侨，荷兰

殖民当局推行“甲必丹”制度。原籍永春仙岭的沈愈及其子景昆、松茂曾在巴城相继为甲必丹。荷兰殖民当局残酷压榨华侨，还于1740年10月9日制造了“红溪惨案”，4天内屠杀上万名无辜华侨，不少泉籍华侨丧生于殖民者屠刀下。惨案过后的一段时间里，闽粤人相减不到印尼。巴城人口剧减，各行各业陷入萧条境地。为挽救颓败的经济，荷兰殖民者于1742年又派人到闽南招募中国商船往巴城经商，并实行优惠政策。翌年起，又有商船运载客货从厦门及附近港口驶往巴城。

1799~1815年，印尼先后沦为法国、英国殖民地。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1812~1815年），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移居印尼的华侨再次增多。1816年，荷印殖民政府成立，改变东印度公司时期限制、迫害华侨的一些政策，华侨移居印尼开始持续增多。

鸦片战争后直到民国年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天灾人祸频仍，泉州出现持续向印尼移民的高潮。据鲤城区浮桥、江南、罗溪等地的族谱资料，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不少旅居印尼华侨人数千人以上的侨村。如树兜村，以及延陵吴氏、罗溪黄氏、江南尤氏等。

民国20~22年（1931~1933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泉州地区往印尼人数大大少于从印尼回国人数。民国23~28年间，泉州人大批涌向印尼，但时间短暂。1940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印尼华侨回国的人数日增。

1942年初，日军占领印尼各地，大肆逮捕、迫害华侨和华侨领袖。侨领洪渊源、黄怡瓶、刘心田、尤清海、黄周规、陈兴砚等许多泉籍人士被囚禁，直至日本投降才出狱。面对入侵日军的暴行，广大华侨与当地人民并肩奋起反抗，先后组织了“民族抗日解放大同盟”、“华侨抗日协会”、“苏东反法西斯总同盟”等华侨抗日社团，对日本法西斯统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日本投降后，广大华侨又参加印尼反抗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不少泉州人参加苏加诺的部队。如原籍南安傅孙中，出任印尼抗荷军的团长。

抗日战争胜利，回乡的归侨纷纷重返印尼。民国36~37年，共有18291人经厦门往印尼。同期，经厦门返乡的印尼华侨有9352人。两年间往印尼人数净增8939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尼政府自1953年起严格限制中国移民入境。与此同时，印尼华侨青少年回国参加建设和就学的人数逐年增多。1959~1967年，有20多万华侨、华裔被迫回国，其中由晋江专区负责接待安置的即有1万多人。60年代起，也有一些印尼华侨移居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

荷印政府1930年的人口调查分类数字表明，印尼华侨以闽南人后裔为多。据国内外报刊发表的有关海外华人口资料，印尼泉籍华侨、华人总数约占印尼闽籍华侨、华人总数的55%，相当于印尼华侨、华人总数的30%。至1990年，估计居住在印尼的泉籍华侨、华人总数有154万人，其中三代以上的华裔占70%以上。主要集中在雅加达、泗水、棉兰、直落勿洞、望加锡（即锡江、乌戎潘当）等五城市及郊区；次为爪哇的井里汶、三宝垄、日惹、玛琅、万隆，苏门答腊的巨港、先达、占碑、日里丁宜，加里曼丹的三马林达、巴厘巴板、马辰，苏拉威西的万鸦佬，马古鲁的安汶、巴厘等一系列城市及郊区。

印尼泉州人祖籍以南安、鲤城为多，次为安溪、永春、晋江、惠安，再次为金门、德化、石狮，其中鲤城区浮桥、江南、罗溪，惠安的山霞，南安的丰州一带，有不少村目前定

居印尼的华侨、华人人数均已超过四五千人。

二、职业与经济

唐及五代，往印尼的泉州人以船员、自耕农和从事商贸的商人、小商贩为主。北宋年间，又有一些手工艺匠前往印尼定居，苏门答腊的兰里（亚齐）成为漳、泉海商船舶修理、货物集散和转运商品的重要港口之一。从元代历经明代，移居印尼的泉州人多从事垦殖、农、渔、商贩，次为建筑、酿酒、伐木、烧炭、制砖、打铁、木工、裁缝等各种行业。少数华商成为承包税收者、劳务经纪、出入口商。早期最著名的是荷印巴城总督范·狄门称为“伟大的商人”的泉籍华商曾聪。

曾聪（？～1639年），又名龚泰，原是木匠，先移居万丹，继而成为第一批从万丹抵巴城的移民，他是劳力经纪商、进出口贸易商，同时又是公共建筑承包商，还经营伐木、承包税收，并获铸币专利。巴城建城时期的主要工程（包括城墙），大都由他承包。同时他还开辟甘蔗种植园，引种甘蔗，为巴城的制糖业开了先河。

17世纪20～30年代，每年都有4～5艘载有茶叶、糖、粗瓷器、铁锅、纺织品、日用百货和华工的商船从泉州、厦门等港口往巴城和爪哇的万丹。明天启五年（1625年），由泉州开往巴城一艘商船载有360人，到达后，都成为到处叫卖中国瓷器的小贩。

17世纪40年代中期起，有些来自泉州地区甘蔗产区的华侨开始经营小规模甘蔗种植园，或创设手工制糖作坊。嗣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推行强迫种植经济作物制度，泉籍华侨纷纷将早年开垦的小块土地卖给公司，将资金投入商业领域，成为推销商品及收购土产的中介商及零售商。

1850年，荷印政府废除承包税收制度。1870年，全面取消原来对华侨经营工商业的各种限制，荷印进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初期，华侨经济处于幼弱状态，根本无法与资本强大的荷兰、英国企业竞争。1893年，原籍同安的黄仲涵率先把建源公司扩充为在同乡中发行股票的有限公司，突破了荷印公司对糖的垄断。紧接着在其他土产加工、出口贸易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先后出现一些经营各类批发业务的公司及工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泉籍华商在这期间得到一定程度发展。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批中产者，以及少数资本较大的企业家及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有“糖王”黄奕住（南安人）、“咸鱼大王”陈兴砚（永春人）。此外，经营咖啡出入口商号的吴河水（晋江人），经营食油厂、碾米厂和皮革厂的黄怡瓶（南安人），经营胡椒、咖啡等土产批零的陈迥义、陈丙丁叔侄，经营茶叶、白布、花裙厂、织布厂的李传别、李金水父子，经营花裙厂的李长维（均安溪人）等，企业规模都较大。泉籍华侨职业已由早年的以农渔、手工业、中介商、小商贩为主，转为以经商、办工厂，包括零售商、中小企业主为主。

1929～1933年，出现世界性经济危机，加上日本向印尼大量倾销商品，欧洲出入口商为掠取高利润，把商品直接卖给零售商，不少华侨中介商不得不缩小经营范围，甚至倒闭。泉籍华商因经营得法，并有少数早就转向经营出入口业，所以企业倒闭较少，但也每况愈下。

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因华侨抵制日货，以及荷兰殖民者对华侨企业课以重税，致使华

侨经济恢复十分缓慢。日本占领印尼后，华侨经济遭到空前浩劫。

印尼独立后，华侨经济经历了从恢复到发展的变化。泉籍人传统经营的行业，以经济作物种植加工业发展最为迅速。林生地（安溪人）家族的 SAMPORNA 公司发展为大公司，生产驰誉东南亚的 234 牌和 SAMPORNA 牌手卷丁香烟。王宁泄、王宁恭（南安人）兄弟兴办的协福甘文烟厂、宝大甘文烟厂发展为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联合企业。黄奕聪（鲤城人）的椰子种植、加工、出口业也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在新兴工业方面，陈祥基（安溪人）的金轮（即罗达玛斯）有限公司投资面粉制品、调味品、锌板等制造厂，开始多元化经营。在金融业方面，先后出现陈江苏（陈迺义、陈丙丁）家族经营的一诚行银行；黄仲咸、黄仲伍兄弟（南安人）经营的必利达银行；黄奕聪家族与黄欲水、黄正泉父子（南安人）联合经营的雅加达国际银行；同美公司东主王尚志（金门人）的同美信局等小型华资银行、金融、汇兑、保险企业。在进出口贸易方面，鲤城人吴善用在沙拉望加、高浪那尔两埠经营土产业，且置有 10 多艘轮船，经营出入口业。李金水（安溪人）在马来亚怡保设立分公司，经销其家族胜记系列企业产品。其他行业也出现一些富商。陈兴砚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营土产和咸鱼加工出入口业，在香港、新加坡合资设公司，在印尼还拥有快乐世界、中华游泳池、5 家电影院、纺织厂和橡胶园。董祝三（鲤城人）不但经营大型香粉厂，1956 年还在雅加达开设大型椰油厂。王长水（安溪人）经营的王长水茶行拥有多家分行。

50 年代初，印尼政府开始施行人口商“新政策”，多数华商难以适应，陷入困境，泉籍华商自不例外。60 年代后期，印尼政府采取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70 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泉籍华商经营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有：黄奕聪的金光集团，陈祥基的金轮集团，黄印当兄弟（南安人）的德河（集团）有限公司，徐清华（鲤城人）持股 60% 的成功集团及大都会集团，傅仰杏（南安人）家族的企业集团，吴家熊（鲤城人）持股 50% 的大马集团等。

1977 年，印尼政府明文规定，自 12 月 31 日起，禁止非印尼籍人从事外贸商业活动。紧接着印尼政府又放宽加入当地国籍的政策，许多华侨加入了当地国籍，或将企业转交已入印尼籍的子女经营，华侨经济演变为华人经济，成为当地民族经济的一部分。

三、文化教育

（一）华文学校

印尼华侨创办的华文学校，以 1690 年 6 月巴城甲必丹郭训观创办的义学为嚆矢。嗣后，巴城明诚书院、南江书院相继创立，均为以闽南方言教学的私塾。印尼近代华文教育始于 1894 年的泗水中华学馆，后改为泗水中华小学堂。1901 年，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又创办中华学馆。此后，各地也都陆续办起华文小学，教师多从祖国聘请。华侨子弟在华文学校毕业后，接受高等教育需到中国；荷华学校毕业生，可进入当地高等学校或赴荷兰高校深造。泉籍人士为主创办的华文学校，至 1963 年尚存 30 多家。

表 45-10

印尼泉籍人士为主创办的华文学校简表

单位：人

学校名称	创办年份	学生数	教员数	主办单位	董事会负责人
雅加达新华小学	1905			雅加达新华中小学董事会	黄衍田
雅加达中华中学	1939	4000	100多	雅加达中华中学董事会	吕俊诚
雅加达中华师范班	1946			雅加达中华中学董事会	吕俊诚
雅加达新华中学	1948	3000		雅加新新华中小学董事会	黄衍田
椰城培英中学				椰城培英学校董事会	谢长岁
泗水新华中学 (附设新华小学)	1934	3000多	90多	泗水新华中学董事会	陈建来
泗水服务中学	1946	600多		新群社、寄傲社	叶存胥 周文墨
泗水中华中学	1948	1955	51	泗水中华中小学董事会	吴伟鹏
泗水中华小学				泗水中华中小学董事会	吴我炎
泗水开明中学		1969	31	泗水开明中小学董事会	吴伟鹏
泗水开明小学				泗水开明中小学董事会	吴我炎
泗水振文中学 (附设小学)				振文中学董事会 (晋江、南安华侨合办)	
玛琅玛华小学	20年代			玛华中小学董事会	黄和凉
玛琅玛华中学	30年代			玛华中小学董事会	黄和凉
日惹中华中学	1946			日惹中华中学董事会	王长水
日惹中华小学(2校)	1946			日惹中华小学二校董事会	王长水
棉兰苏东中学(高中、 初中、一至四小6校)	1910	6000多	200多	苏东中学董事会	史联对
棉兰南安中学(高中、 初中、小学3校)	20年代	1500多	39	棉兰南安会馆及南安中小学董 事会	张尚买
棉兰晋江学校	“二战”前	860多	20多	棉兰晋江会馆及晋江学校董 事会	
巴东新华学校(中学、 小学)				巴东华侨公会、学校理事会	郑斐然
锡江新华学校 (初中、小学、幼儿园)	1940	800多		锡江晋江会馆及新华学校董 事会	林晓端

(二) 报 刊

印尼最早的华文报刊是1822年出版的《特选撮要》，1826年停刊。1885年由泉籍华侨施显龄任主编的《马来鼓声报》是印尼最早以华裔为读者的印尼文华侨报刊。后施显龄买下该报，改为《垅川之烛报》，出版至1913年。